

涂丹《香药贸易与明清中国社会》绪论

一、选题旨趣

海上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中国与亚、欧、非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往来海上通道的统称，不仅是中国丝绸运销海外的重要孔道，亦是瓷器、茶叶、香药、白银等物资交汇流通的平台，承载了不同文明的互动与交融。研究明清时期东亚海域香药贸易，不仅能够充分发掘古代丝绸之路特有的价值和理念，且是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基础和精神内涵。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香药的输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明中叶以后，随着民间海外贸易的发展，香药的进口数量大增，开始被时人广泛应用于宗教祭祀、熏香化妆、医疗保健、日常饮食等各个领域。直至今日，香药对我们的生活依然产生着重要影响，只是其更多的时候是以化工合成品的形态存在，我们也就忽视了对它本来面貌的追寻。因此，展开香药贸易的研究，无论是对于探究明清中国海洋经济的发展形态，还是勾画东亚海域贸易网络的图景，抑或讨论明清日常生活史的相关问题，都是一个很好的视角和路径。

自古以来，海洋既是阻隔不同区间人们互通有无的障碍，亦是承载世界各地物质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随着航海知识和造船技术的不断进步，海洋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在中华文明史上，海洋文明的演进自西周晚期、春秋时代已逐步开始，前后经历了东夷百越时代、东西洋时代、海洋竞逐时代和海洋复兴时代。通过海洋为纽带，中华文明远播海外，与此同时，多元的域外物质文化也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和改变着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长期以来作为舶来品代名词的香药，其影响尤甚，亦最具代表性。因此，研究域外香药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对

于探讨中国海洋文明史的丰富内涵颇有意义。

之所以选择将研究的时段确定在明清，一是由于学术界关于香药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宋元，对于明清时段的研究则关注较少。二是由于研究明清香药贸易具有极大政治、经济和社会价值。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看，明清时期统治者虽多次厉行海禁政策，但香药的输入从未间断。明前期，海禁政策执行虽严，官方的输入渠道却大开，宣德（1426-1435年）以后，曾经轰轰烈烈的郑和下西洋活动虽然停止，朝贡贸易亦日趋衰落，而民间海外贸易却在海禁政策的夹缝中悄然兴起。从全球史的视角看，自15世纪开始，在海洋为纽带的联结下，全球市场逐步形成，世界各国的物质文化交流逐步加强，香药成为这一时期中国、西欧和东南亚等国在东亚海域争夺的主要商品。从贸易史的视角来看，香药贸易作为明清时期海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虽受政府政策影响，但并未受其左右。研究明清香药贸易，不仅能够更好地揭示这一时期官方与民间、中央与地方围绕海洋政策所进行的博弈，以及民间和地方在不满朝廷政策时所进行的规避措施及应对机制，亦能更为清晰地勾勒亚洲海域贸易网络的构建过程，以及在这期间各方海洋势力的此消彼长。

至于选择将香药贸易与中国社会经济的关系作为重点考察对象。首先香药作为日常生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作为海洋贸易标志性产品的香药，明清时期广泛应用于宗教祭祀、熏香化妆、防腐避垢、治病疗疾、日常饮食等领域，对时人宗教观念、健康饮食习惯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这正是日常生活史研究的重要议题。其次，明清时期香药的输入，不仅对从中央到地方的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香药传入中国后被时人赋予了多重社会应用职能，探讨香药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研究明清财税制度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再次，香药被时人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的史实，不仅从细微处重现了明清时期的生活百态，而且对于追寻不同文明间的互动交流，研究海洋文明对陆地文化的辐射与影响十分有益。

此外，传统海洋贸易史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我国古代丝绸、瓷器和茶叶

等物品的对外输出和对世界历史贡献的探讨，沉湎于“中国”俯瞰“四方万国”的自豪之中。然而，中国在东亚海域的贸易，并非只出不进，商品的互换与文化的交流都是双向互惠的，香药作为明清时期进口的最主要商品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积极影响。这一研究现状与明清时期亚洲贸易网络中香药贸易占据重要地位的历史事实，以及香药贸易对社会经济、日常生活和文明互动带来的巨大影响极不匹配。鉴于上述多重因素，因此，研究香药贸易不仅是对传统中外交流史研究的有益补充，亦提供了一个站在东亚海域看中国的新的研究视角。

二、研究现状

本书以香药贸易为研究对象，以海上丝绸之路为背景，内容涉及香药的概念、种类、产地、功用、输入途径、运销网络、贸易数量，以及香药贸易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多层面的影响。从研究领域看，不仅涉及海洋史、经济史、物质文化史、医学史和日常生活史多个领域，且每一领域与本研究的关系亦轻重不一，故很难就相关领域的已有成果，做全面系统的梳理分析。香药作为本研究的核心问题，相关研究成果也较为集中，故此本书将围绕这一主题对该领域的已有成果进行系统讨论。

纵观学术界关于香药贸易的研究，目前已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研究时段多集中于宋元，对于明清时段的研究缺乏足够的关注，偶有涉猎也主要集中于明前期，且多将其看作朝贡贸易或郑和下西洋的分支问题进行探讨，很少将“香药”作为研究核心进行深度的考察。关于明中叶以后民间香药贸易的问题几乎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盲点，而这一研究现状与香药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产生的重大影响极不匹配。即便如此，目前学术界一系列与此论题相关的研究成果依然为对本课题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尤其是学者们关于汉唐、宋元时期香药贸易的研究，以及史学界和中医学界关于各类香药的研究为本研究的展开准备了重要起点。此外，学界关于

海外贸易的整体性研究成果亦为本书的写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关于香药特性及应用的研究

关于香药的特性、源流、功能及应用等相关问题的研究与考辩，史学界及中医学界皆有诸多涉及。自 20 世纪初开始，王璉、云楼、黄素封、王鞠侯等学者先后在《科学》、《妇女杂志》、《绸缪月刊》、《南洋研究》上发表文章，¹从科学普及的角度概括性地介绍了香药的种类、产地及应用等问题。随后，日本学者山田宪太郎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出版的《东亚香料史研究》、《香料の道：鼻と舌西东》和《香料博物事典》三本著作，²系统论述了香药的种类、特性、运销及应用的历史。然而，史学界绝大多数的研究成果则选择时间为脉络进行探讨，中医学界的则多以本草学和药物学为关注点进行研究。

汉唐时期的香药研究，学者们的关注点多集中在西北内陆地区。陈明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三篇文章分别以不同个案为对象，详细呈现了汉唐时期中外医药交流的多元面相。《“商胡辄自夸”：中古胡商的药材贸易与作伪》一文，以中古时期胡商的药材贸易活动为对象，探讨了中土市场上存在的胡药假伪情况，并对此现象在当时的社会反映进行了初步分析，试图以此勾勒出胡药辨伪的历史轨迹，进而揭示胡商在商业贸易中的多面相。作者指出，对于胡药，中土人士形成了两种观念。“一方面，他们认为波斯、印度、西戎来的药物质量好，性能佳，可补本土之不足，增加了对付疾病的手段，又丰富了日常生活的趣味。另一方面，他们认为胡药又

¹ 王璉：《香料之论略》，《科学》1919 年第 4 卷第 10 期；云楼：《香料杂谈》，《妇女杂志》1925 年第 11 卷第 12 期；黄素封：《南洋的香料》，《绸缪月刊》1935 年第 2 卷第 4 期；王鞠侯：《南海输入香料品类考》，1940 年第 9 卷第 4 期。

² （日）山田宪太郎：《东亚香料史研究》，东京中央公论美术社 1976 年版；《香料の道：鼻と舌西东》，东京中央公论美术社 1977 年版；《香料博物事典》，京都同朋舍 1979 年版。

多假伪，胡商(以及中土商人)制造与贩卖假药，使得人们对此增添一份戒心和某种程度的不信任感。”³《汉唐时期于阗的对外医药交流》一文，以作为丝绸之路要道的于阗为个案，探讨了汉唐时期于阗对外医药文化交流的状况。通过分析，作者试图从史料中勾勒出汉唐时期在文化交流中于阗医药文化史的某些特征，对重塑中古时期丝绸之路医学史的总体面貌做了重要补充。⁴《“法出波斯”：“三勒浆”源流考》一文，详细梳理了“三勒浆”在唐、宋、元三代的演变历程，并全方位对比了该物在其原产国印度、中转国波斯及中国的应用情况，作者试图以“三勒浆”为例，揭示“中、印、波三地某些饮食习俗的传递与吸纳”，呈现“三地文化和宗教之间的差异、选择与互动”。⁵

温翠芳的一系列论文对汉唐时期中外香药交流做了深入探讨，其博士学位论文《唐代的外来香药研究》，不仅论述了唐代从西域进口的大量香药及这些香药在唐人生活中的广泛应用，而且考察了唐代广州的香药贸易状况。作者认为，香药换丝绸实为中古时代东西方贸易之主要推动力。鉴于此点认识，该文对从葱岭以西、地中海以东广大的西域地区输入唐代中国的各种香药进行了考察，并着重探讨了这些外来香药在唐人世俗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此外，关于唐代广州香药贸易的考察，作者指出，“唐前期活跃在波斯湾到南中国海上贩运香药的主要是波斯人；而在 762 年之后，随着黑衣大食帝国迁都巴格达，遂带来了中国与阿拉伯之间海上贸易的黄金时代，而阿拉伯人也由此介入了获利巨大的海上香药贸易。”⁶《中古时

³ 陈明：《“商胡辄自夸”：中古胡商的药材贸易与作伪》，《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

⁴ 陈明：《汉唐时期于阗的对外医药交流》，《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

⁵ 陈明：《“法出波斯”：“三勒浆”源流考》，《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

⁶ 温翠芳：《唐代的外来香药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2006年。

代丝绸之路上的香药贸易中介商研究》一文，对中古时代的香药贸易商人、贸易路线、贸易产品及商人们从事香药贸易的深层原因等问题进行了详细介绍。⁷《汉唐时代印度香药入华史研究》、《汉唐时代南海诸国香药入华史研究》两篇文章，⁸分别探讨了印度及南海国家所产香药的入华途径及在中国的应用情况。吴娟娟的硕士学位论文《香料与唐代社会生活》，在介绍唐代香料种类及来源的基础上，论述了香料在世俗及宗教领域的应用情况，分析了唐代用香之盛的原因及影响。⁹

余欣的《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一书，对附子和茺菁两种植物所作的细致论考，严格来说虽算不上香药研究的范畴，但其研究视角及所应用的理论方法十分值得学习。作者从新博物学史整体架构的理念出发，以物种为线索，探讨了物在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层面的意义，并试图以此追寻一些值得珍藏的不同文明之间互动的痕迹。关于舶来品的内涵，该书指出，即使是本土物产也会被蒙上一层浓厚的舶来品色彩。对于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作者认为，不能单从史实本身加以解释，而应从文化心理的角度进行思考，并在该节最后引用薛爱华的一句话进行总结，“舶来品的真实活力存在于生动活泼的想象的领域之内，正是由于赋予了外来物品以丰富的想象，我们才真正得到了享用舶来品的无穷乐趣。”¹⁰

关于宋元时期香药的应用研究，相较于其他时段更为丰富，且尤以宋代为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刘静敏的《宋代〈香谱〉之研究》一书，该书不仅对先秦至隋唐中国社会的用香情况进行了详细梳理，且对宋代

⁷ 温翠芳：《中古时代丝绸之路上的香药贸易中介商研究》，《唐史论丛》第十二辑。

⁸ 温翠芳：《汉唐时代印度香药入华史研究》，《全球史评论》2010年第00期；《汉唐时代南海诸国香药入华史研究》，《贵州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⁹ 吴娟娟：《香料与唐代社会生活》，2010年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¹⁰ 余欣：《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16页。

《香谱》的源流发展、编撰体例，《香谱》在宋代盛行的背景及原因，《香谱》种类及其撰修者，香方的承袭及发展，香品器的使用情况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逐一论证。¹¹全面呈现了宋代香文化发展的整体图景，成为研究宋代香文化不可不读的佳作。

夏时华的四篇论文从不同角度阐释了香药对宋代社会的影响。《宋代香药现象考察》一文，依次考察了宋代社会的香药来源、香药贸易概况、香药与宗教活动、香药与贵族平民的生活、香药在中医养生保健中的运用等问题，并对香药消费对社会带来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进行了分析。¹²《宋代香药业经济研究》一文，主要从宋代香药朝贡贸易和民间海外香药贸易、政府对香药的禁榷经营、民间香药销售和生产加工经营、香药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宋代社会的香药消费等方面，对宋代香药业经济进行了考察。作者认为，“宋代香药进口贸易、贩运、加工生产、销售，直至香药消费，已形成一个重要的香药业经济”，且已成为“仅次于盐业、茶业、酒业等之外的一大产业经济”，在宋代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¹³《宋代上层社会生活中的香药消费》和《宋代平民社会生活中的香药消费述论》两篇文章，论述了不同社会阶层的香药消费情况。¹⁴前文对宋代上层社会香药消费的概况、特点、原因、影响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从作者的论述可见，宋代富裕阶层的香药消费涉及饮食、熏香、宴饮、香囊、沐浴、美容、制墨、建筑、宗教诸领域，表现出其消费的广泛多样性、奢侈性、雅致性、部分市场化等特点。关于宋代平民的香药消费情况，作者同样认为十分兴盛，

¹¹ 刘静敏：《宋代〈香谱〉之研究》，文史哲出版社 2007 年版。

¹² 夏时华：《宋代香药现象考察》，硕士学位论文，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2003 年。

¹³ 夏时华：《宋代香药业经济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2012 年。

¹⁴ 夏时华：《宋代上层社会生活中的香药消费》，《云南社会科学》2010 年第 5 期；《宋代平民社会生活中的香药消费述论》，《江西社会科学》2010 年第 12 期。

“并表现出其消费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市场化、生存性与享受性并存等特点”，并指出“宋代广大平民在饮食、医疗、沐浴、化妆、建筑、婚育仪式、宗教活动、节日习俗等社会日常生活中香药消费兴盛，香药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消费品”。然而，笔者认为，宋代虽由于海洋贸易的兴起，大量香药通过海路进入中国，但香药的消费仅限于宫廷、官宦之家和富商大贾等富裕阶层，在普通百姓看来，香药仍属奢侈品范畴，只有在重大节日或宗教活动中，香药才得以进入普通民众的生活。

孟彭兴的《论两宋进口香药对宋人社会生活的影响》一文，从唐宋以来海上贸易的发展、香药国际贸易新格局、政府财政收入等层面论述了两宋时期香药贸易的发展概况。文章随后探讨了香药进口给宋人生活带来的多层面影响，作者认为，在两宋政府积极扶持下的香药贸易，在促进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丰富我国的药物宝库、提高中医治疗技术的同时，也助长了奢靡之风，导致贫富分化严重，加剧了社会矛盾。¹⁵彭波、陈争平、熊金武的《论宋代香料的货币性质》一文，以宋朝政府财政危机为切入点，运用历史学和金融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了宋代香料的货币性质。文章指出，宋代香料的货币性质比较强烈，是国家所依赖的重要金融工具，“既可以变卖成现钱，也可以直接用于对内对外支付，还可以充当政府经营的资本，并充当国家信用的保证，甚至于发展到在其价值的基础上发行信用凭证充当流通手段。”¹⁶

庄为玑、庄景辉的《泉州宋船香料与蒲家香业》一文，首先介绍了宋代中国进口香料的种类及从事香料贸易的商人，接着论述了蒲寿庚家族香

¹⁵ 孟彭兴：《论两宋进口香药对宋人社会生活的影响》，《史林》1997年第1期。

¹⁶ 彭波、陈争平、熊金武：《论宋代香料的货币性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2期。

业的经营与传承。作者认为，自唐代以来，从事南海香料贸易的多为阿拉伯人，有的因从事香料贸易还被封赐官爵。¹⁷吴春明的《考古发现的几类海洋舶来品》一文，从考古发现的沉船物品为切入点，对香药贸易的意义做了颇有价值的阐释。作者认为，“传统的海交史、贸易史、经济史的研究主要着力于我国古代瓷器、丝绸、茶叶等物品的对外输出和对世界史贡献，勾画出‘陶瓷之路’、‘丝绸之路’、‘茶叶之路’，沉湎于中国鸟瞰四方万国的、怀柔天下蛮夷的快感中。其实，在东南沿海海洋社会经济体系中，帆船的往来、商品的互换与文化交流都是双向互惠的，从西、南洋航路各国舶来的香料药物，就给古代中国文化增色不少。”¹⁸

关于明清时期香药的应用情况，目前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明代，清代的探讨则较少。陈冠岑的《香烟妙赏：图像中的明人用香生活》一文，通过对明代图像数据、绘画、版画及壁画的整理与分析，探讨了明人的用香场合、用香情境和焚香炉具，很大程度上重现了明人的用香生活。¹⁹张维屏的《满室生香：东南亚输入之香品与明代士人的生活文化》，对明代香药的输入种类，及明代士人的用香情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²⁰

黄瑞珍的《香料与明代社会生活》一文，以“需求-供应-消费”为路径，考察并分析了香料的供需市场，以及香料在明人社会生活诸领域中的使用情况。作者认为，“明代用香群体完成了从上层到下层的下移，呈现全民化特点。各阶层对香料的铺张使用，刺激了社会奢侈风气的滋长，促进了炫耀性消费心态和享乐主义观念的盛行，并推进了明代中后期商品经

¹⁷ 庄为玠、庄景辉：《泉州宋船香料与蒲家香业》，《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Z1期。

¹⁸ 吴春明：《考古发现的几类海洋舶来品》，载陈春声、陈东有主编：《杨国桢教授治史五十年纪念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50页。

¹⁹ 陈冠岑：《香烟妙赏：图像中的明人用香生活》，2012年逢甲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²⁰ 张维屏：《满室生香：东南亚输入之香品与明代士人的生活文化》，《政大史粹》第5期，2003年7月。

济的发展繁荣。”²¹然而作者在介绍各个时期的香料运用时，皆笼统地认为其用途多、应用领域广、使用普遍，未能很好突出每一个时代的特色，以及香料运用的演进轨迹。此外，王尔敏的《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和巫仁恕的《品位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²²对于香药在明清日常生活，尤其是饮食领域的运用，亦有所涉及。

王铭铭的《说香史》一文，以学术随笔的形式，对顾炎武《日知录》中所列《日知录之余》卷二《禁番香》中的相关史料进行了发散性的分析，其中涉及到“禁番香”政策下达与推行的始末，国人焚香习俗的由来等很有意义的问题。²³文中的一些分析对于我们理解明代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颇有启发。关于龙涎香与葡人居澳的关系，戴裔煊的《〈明史·佛郎机〉笺注》、郑永常的《来自海洋的挑战——明代海贸政策演变研究》、金国平的《龙涎香与澳门》、李飞的《龙涎香与葡人居澳之关系考略》皆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²⁴此外，梁其姿的《明代社会中的医药》、唐廷猷的《中国药业史》和邱仲麟的《明代的药材流通与药品价格》等著述中，²⁵亦有部分内容涉及到香药的产地、运销、应用等相关问题。

林日杖的《大黄与明清中外关系》虽不能归入香药研究的范畴，但该文却是研究中外药材交流的很好范例。该文试图以大黄这种中国特产药材为核心，来讨论明清中外关系的变迁，阐释一种物质或说一种商品对中外

²¹ 黄瑞珍：《香料与明代社会生活》，硕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2012年。

²² 王尔敏：《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37-52页；巫仁恕的《品位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47-276页。

²³ 王铭铭：《说香史》，《西北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

²⁴ 戴裔煊：《〈明史·佛郎机〉笺注》，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3页；郑永常：《来自海洋的挑战——明代海贸政策演变研究》，台北稻乡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205页；金国平：《龙涎香与澳门》，载金国平、吴至良《镜海飘渺》，澳门成人教育学会2001年版；李飞：《龙涎香与葡人居澳之关系考略》，《海交史研究》2007年第2期。

²⁵ 梁其姿：《明代社会中的医药》，蒋竹山译，载《法国汉学》第6辑，中华书局2002年版；唐廷猷：《中国药业史》，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7年版；邱仲麟：《明代的药材流通与药品价格》，《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9卷，2008年7月。

关系发生影响的模式。作者指出，“从一种物质或说一种商品的角度切入中外关系史，既是对经济史研究的革新，也是对中外关系史研究的突破”，其不仅扩大了经济史的影响范围；而且“将中外关系史关注的重心，由人转向了物”，²⁶视角新颖独特。

目前史学界关于香药特性及其应用的研究，除以朝代为界线进行的探讨外，还有一些整体性的研究成果，或以单一香药品种为例进行的分析。杰克·特纳的《香料传奇》一书，从欧洲人对宗教、对香料的崇拜，以及航海探险的发展为开端，探讨了西欧人追逐香料的原因。进而从味道、肉体、精神三个层面详细论述了香料在欧洲社会的应用情况。该书采用故事兼论述的方式，生动展现了一部以香料为核心的另类世界史，一幅奇异的西方风俗的画卷。²⁷冯立军的《古代中国与东南亚中医药交流研究》，从中外关系的视角出发，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间的中医药交流，做了细致描述和分析。全书以中药材作为海外贸易商品的关注点，突出海外华人在双方中医药交流中的载体作用，同时，以族群认同理论来解析中医药在东南亚的传播和发展。“另外，还通过对古代中国与东南亚中医药交流的研究，再现了彼此之间长期存在的朝贡贸易关系、民间海外贸易关系以及贸易与移民等各种较为复杂的关系，对于思考和创新东亚海洋经济秩序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作用和现实意义。”²⁸傅京亮的《中国香文化》和周文志、连汝安的《细说中国香文化》及陈云君的《燕居香语：中国香文化宝典》，²⁹分别从历史

²⁶ 林日杖：《大黄与明清中外关系》，博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2011年。

²⁷ （澳）杰克·特纳：《香料传奇：一部由诱惑衍生的历史》，周子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²⁸ 冯立军：《古代中国与东南亚中医药交流研究》，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

²⁹ 傅京亮：《中国香文化》，齐鲁书社2008年版；周文志、连汝安：《细说中国香文化》，九州出版社

学、哲学、文学的角度探讨了沉香、檀香、丁香、龙涎香等多种香品的应用情况，及各类香具的使用方法，并系统梳理了古代文人与香的关系。然而，三本著作多集中于对香的文化性的探讨，而对于各类香品在宗教祭祀、治病疗疾领域的应用，及普通平民的用香情况则涉及较少。

以单一香药作为对象的研究，目前亦有部分学术成果，其主要以学位论文为主。陈宝强的《宋代香药贸易中的乳香》一文，对宋代社会中的用香风气，乳香在社会下层的应用，乳香对中国医学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论述。文章指出，相对于其他香药，乳香在宋代“具有数量巨大、价格较低和应用广泛的特征”，故其影响也最大。³⁰于景让的《说沉香》和吴世彬《沉香文化的发展及其现代应用》，³¹对沉香使用的发展历程及被赋予的文化意涵进行了探讨，并对沉香在当代社会的应用情况进行了详细论述。张亚丽的《历史时期豆蔻的使用与分布》，对豆蔻的种类及用途进行了详细介绍，并对历代文献中关于豆蔻生长地域的信息进行了梳理，从自然地理学角度论述了不同豆蔻品种的产地分布情况。³²

中医学界对香药特性及功用的探讨，多从本草学和临床学角度进行论证分析。例如，宋岷的《〈本草纲目〉与伊斯兰（回回）医药的关系》一文，对《本草纲目》中记载不甚详细的五种伊斯兰本草药物的性状及功效，进行了详细考证；其《论大食国药品——无名异》一文，对宋初传入中国的阿拉伯药品无名异的名称、性状、功用、制取方法进行了详细考证，作

2009年版；陈云君：《燕居香语：中国香文化宝典》，百花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³⁰ 陈宝强：《宋朝香药贸易中的乳香》，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历史系，2000年。

³¹ 于景让：《说沉香》，《大陆杂志》1976年第1期；吴世彬：《沉香文化的发展及其现代应用》，硕士学位论文，佛光大学人文学院，2007年。

³² 张亚丽：《历史时期豆蔻的使用与分布》，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历史系，2010年。

者认为，无名异与木乃伊实为同一种药物，埃及的木乃伊做为地中海地区历史悠久的药品和传统商品在宋代已输入中国。³³金素安、郭忻的《〈海药本草〉蜜香、木香、沉香之考辩》一文，通过对《海药本草》中所记蜜香、木香、沉香的考辩，指出该书记载的蜜香和沉香均为瑞香科正品沉香，蜜香可视为沉香的别名。作者进一步指出，虽然蜜香可以作为木香或沉香的别名，但为了临床用药的准确性，建议在临床的处方中明确使用药物的正名。³⁴靳萱等的《浅析〈海药本草〉记载的七味回族常用药物》，对《香药本草》中记载的熏陆香、没药、紫矿、阿魏、萆拔、缩砂蜜、苜蓿子七味香药进行了辨析，并结合《回回药方》进行了相关阐释。³⁵从临床药理学角度探讨香药功用的文章颇多，兹仅举几例。王慧芳的《古代用香料药物预防疾病的方法》，从熏香、佩香、含香、浴香四个方面，阐释了香药的祛邪辟秽功效。³⁶王亚芬的《元〈御院药方〉中有关香药的临床应用》一文，对《御院药方》中涉及的香药进行了综合归纳，论述了这些香药在治疗中风、脾胃失调、疮肿、风寒湿气、跌打损伤等领域的运用。³⁷孙磊等人的《乳香基原的本草学、植物学和成分分析研究》一文，从本草学、植物学和药理学角度分析了乳香的特性，并从中药学角度阐释了乳香的植物成分及分类标准。³⁸

此外，亦有部分学者以医药交流、考古资料为切入点，论述了香药在医疗领域的应用情况。例如，陈湘萍的《〈本草图经〉中有关医药交流的

³³ 宋岷：《〈本草纲目〉与伊斯兰（回回）医药的关系》，《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2期；《论大食国药品——无名异》，《中华医史杂志》1994年第3期。

³⁴ 金素安、郭忻：《〈海药本草〉蜜香、木香、沉香之考辩》，《上海中医药杂志》2011年第2期。

³⁵ 靳萱等：《浅析〈海药本草〉记载的七味回族常用药物》，《宁夏医科大学学报》2011年第8期。

³⁶ 王慧芳：《古代用香料药物预防疾病的方法》，《江苏中医药杂志》1982年第1期。

³⁷ 王亚芬：《元〈御院药方〉中有关香药的临床应用》，《中国中药杂志》1995年第3期。

³⁸ 孙磊等：《乳香基原的本草学、植物学和成分分析研究》，《中国中药杂志》2011年第2期。

史料》一文，通过对《本草图经》中涉及的有关中外医药交流的史料进行分析，发现北宋中叶外来药物在中国已有较普遍的使用，且这些药物已融入中国传统医药体系之中。³⁹吴鸿洲的《泉州出土宋海船所载香料药物考》，以 1974 年 6 月 8 日出土于泉州后渚港的宋船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宋代香药的输入盛况，并对部分香药的产地及功效进行了考证分析，进而论述了外来香料药物的输入对我国医学发展带来的多重影响。⁴⁰而王琳、李成文的《宋代香文化对中医学的影响》一文，则从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三个角度探讨了宋代香文化盛行的原因，从本草学、方剂学、临床医学三方面探讨了香药对中医学产生的积极影响。同时作者还指出，“香药的广泛应用，尤其是《局方》的盛行，造成过用、滥用香药之弊，也给中医学带来了不良影响。”⁴¹

（二）关于香药贸易的研究

学界关于香药贸易的研究多集中于宋元时期，研究内容涉及香药的种类、特性、产地、运销、流通、用途、影响等诸多领域。截至目前最为权威和全面的研究成果当属林天蔚的《宋代香药贸易史稿》一书，该书分为三个篇章，详细探讨了宋代香药贸易兴盛的历史背景，介绍了香药的种类、性质、产地、用途等基本特性，并对香药的输入路线及在国内的运销路线进行了论述，此外，该书还对香药贸易与市舶司条例、香药朝贡、香药专卖、香药的储销机构等问题进行了全面阐释，从内外两方面论述了香药贸易对宋代财政及与安南各国关系的影响。⁴²可以说，该书的撰写不仅为后

³⁹ 陈湘萍：《〈本草图经〉中有关医药交流的史料》，《中国科技史料》1994 年第 3 期。

⁴⁰ 吴鸿洲：《泉州出土宋海船所载香料药物考》，《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81 年第 3 期。

⁴¹ 王琳、李成文：《宋代香文化对中医学的影响》，《中华中医药杂志》2010 年第 11 期。

⁴² 林天蔚：《宋代香药贸易史稿》，中国学社 1960 版。

人从事香药贸易研究起到了提纲挈领式的指导作用，而且为日后东西交通史、南洋史的研究做出了较大贡献。然而，由于当时搜集资料的困难，作者对于文集和地方志中的资料运用较少，同时对某些问题的阐释亦不够深入，对于宋代民间海外贸易的探讨亦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然瑕不掩瑜，本书仍是研究香药贸易的一部力作。关于宋代民间香药贸易问题，夏时华的《宋代香药走私贸易》一文有部分探讨，该文从走私的区域、走私人群、走私原因、走私影响，以及政府的措施五方面，对宋代香药走私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⁴³

关于宋元时期中国与阿拉伯的香药贸易交流问题，白寿彝先生的《宋时伊斯兰教徒底香料贸易》一文最早对此做了阐释，该文系统介绍了宋时伊斯兰教徒所从事的香料贸易在南海贸易中的地位，以及这一贸易对宋代经济的影响，和输入香料在中国的销售、药用情况，最后介绍了宋时来华的几位伊斯兰香料商人。⁴⁴随后，宋大仁的《中国和阿拉伯的医药交流》一文，分别从阿拉伯医药传入中国的情况和中国医药在阿拉伯的传播两个层面进行了论述。该文指出，宋元时期，从阿拉伯传入中国的不仅有如何配制药材的香药方，亦有阿拉伯花露水及丸散制作方法。⁴⁵李少华的硕士论文《阿拉伯香药的输入史及其对中医药的影响》，不仅对由汉至清阿拉伯香药入华的历史进行了简要梳理，而且对阿拉伯香药的种类及应用情况进行了详细介绍。同时对中国药材的功效与阿拉伯香药进行了比较，进而从药理学、方剂学等角度阐释了阿拉伯香药传入对中国医药发展的影响。⁴⁶

⁴³ 夏时华：《宋代香药走私贸易》，《云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⁴⁴ 白寿彝：《宋时伊斯兰教徒底香料贸易》，《禹贡》1937年第7卷第4期。

⁴⁵ 宋大仁：《中国和阿拉伯的医药交流》，《历史研究》1959年第1期。

⁴⁶ 李少华：《阿拉伯香药的输入史及其对中医药的影响》，硕士学位论文，北京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院，2005年。

宋元时期泉州港香药贸易的情况，叶文程、李玉昆、聂德宁等学者曾撰文论述。叶文程的《宋元时期泉州港与阿拉伯的友好交往——从“香料之路”上新发现的海船谈起》一文，以1973年发掘于泉州的沉船中的香料、药物为线索，论述了宋元时期泉州港香药贸易的繁盛情形，以及与阿拉伯国家间的贸易往来。⁴⁷李玉昆的《宋元时期泉州的香料贸易》，从香料贸易的种类、数量、用途，市舶司与香料贸易的关系，香料贸易对社会的影响三个方面，论述了宋元时期泉州港香药贸易的盛况。作者指出，宋元时期，泉州进口的香料品种多、数量大、用途广，在满足统治阶级奢侈生活需要的同时，亦对政府财政及社会风俗产生了较大影响。⁴⁸聂德宁的《元代泉州港海外贸易商品初探》一文，以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为核心资料，探讨了通过进口和舶商转销两种途径进入泉州的香药品种，作者试图从进出口贸易商品的角度来探讨元代泉州港海外贸易的发展状况。⁴⁹

刘冬雪的硕士论文《宋代海外贸易对中医药发展的影响》一文，⁵⁰以香药方为中心，详细探讨了香药在宋代医方、医案和传说中的广泛应用，及其对宋代医学的推动。同时，作者还对宋人滥用香药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胡沧泽的《宋代福建海外贸易的兴起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一文⁵¹指出，香料和药物为宋代福建海外贸易进口的最大宗商品，且时人已对香药的诸多药用价值有所认识。

⁴⁷ 叶文程：《宋元时期泉州港与阿拉伯的友好交往——从“香料之路”上新发现的海船谈起》，《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

⁴⁸ 李玉昆：《宋元时期泉州的香料贸易》，《海交史研究》1998年第1期。

⁴⁹ 聂德宁：《元代泉州港海外贸易商品初探》，《南洋问题研究》2000年第3期。

⁵⁰ 刘冬雪：《宋代海外贸易对中医药发展的影响——以香药方的研究为中心》，2011年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⁵¹ 胡沧泽：《宋代福建海外贸易的兴起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目前学界关于明清时期香药贸易的研究，并无太多集中的探讨，但研究明清海外贸易的论著多对此有所涉及。

万明、严小青、包来军等学者关于香药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明初。万明以《敬止录·贡市考》引《皇明永乐志》中的物品清单为中心，并结合宋元方志的相关记载，发现宋元明三代，香药在进口货物中所占比重极高，且明代进口香药的种类及仓储规模皆超过宋元时期，并由此指出，明初朝贡贸易的繁盛超过了宋元，其“海禁并未影响海外贸易的繁盛，海禁不能等同于闭关锁国”。⁵²严小青、张涛的《郑和与明代西洋地区对中国的香料朝贡贸易》一文，⁵³在探讨郑和下西洋采买香料的原因和方式、香料朝贡贸易及民间香料贸易等问题的基础上，指出香料朝贡贸易及郑和下西洋活动不仅引发并推动了民间海上香料贸易的发展，而且增强了中国与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扩大了当时中国在全世界的影响范围。与此同时，受朝贡贸易影响发展起来的民间香料贸易的价值并不能用单一的税收利润来衡量，其对时人社会生活的影响更值得关注。包来军将明代的香料朝贡贸易与西欧香料战争贸易比较分析，指出“围绕着香料，东西方不同的经济观念、贸易方式使得双方的历史发展及结果显得如此对比鲜明：重名与重利，和平交换与战争掠夺，保守放弃与进取扩张，结局是中国的衰落与西欧的崛起。”⁵⁴

田汝英的《葡萄牙与 16 世纪的亚欧香料贸易》一文，探讨了葡萄牙的香料贸易活动及其重要影响，作者认为，“香料贸易是前现代最能体现

⁵² 万明：《明初“贡市”新证——以〈敬止录〉引〈皇明永乐志〉佚文 外国物品清单为中心》，《明史研究论丛》（第七辑）。

⁵³ 严小青、张涛：《郑和与明代西洋地区对中国的香料朝贡贸易》，《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 第2期。

⁵⁴ 包来军：《明朝香料朝贡贸易与西欧香料战争贸易比较》，《兰台世界》2013年第2期。

全球一体化进程、最适宜以全球史视野进行考察的活动”，葡萄牙人在 16 世纪从事香料贸易的活动，不仅实现了欧洲人直接参与香料贸易的夙愿，而且改变了欧洲人的香料观，改变了欧洲香料市场的结构，降低了香料的价格，促使其从奢侈品向大众消费品转化。⁵⁵

小约翰·韦尔斯、大卫·布里贝克、卜正民等西方学者多从全球史的视野探讨 14-18 世纪的香药贸易。小约翰·韦尔斯的《胡椒、枪炮、战地谈判：1662-1681 荷兰东印度公司和中国》⁵⁶和大卫·布里贝克、安东尼·里德等人所著的《14 世纪以来东南亚的出口贸易：丁香、胡椒、咖啡和糖》⁵⁷，以详实的贸易清单为基础，深入探讨了地理大发现时期西欧各国对东南亚香药产地的争夺及在东亚海域的贸易角逐。卜正民的《塞尔登先生的中国地图：香料贸易、佚失海图与南中国海》一书，以一幅被遗忘 350 年的中国航海图为切入点，以香料贸易为纽带，生动呈现 17 世纪中国在东亚及东南亚地区的海外贸易，以及中国在亚洲海洋世界中的位置。⁵⁸

李斌的硕士学位论文《明代中国与东南亚的香料贸易》，将明代中国与东南亚的香料贸易分两个时期，分别介绍了香药贸易的性质、方式、路线、价格、数量及对明政府财政所造成的影响，分析了香料在明朝对外关系中所起的作用。作者认为，第一个时期的香药贸易，“以香料作为贡品输入中国为核心，以朝贡贸易为重点，以香料走私作为辅助；第二时期以西方殖民者东来为起点”。⁵⁹郑甫弘的《明末清初输入中国的南洋物质文化

⁵⁵ 田汝英：《葡萄牙与 16 世纪的亚欧香料贸易》，《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1 期。

⁵⁶ Wills, John E. Jr. *Pepper, Guns, and Parley;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China, 1662-168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⁵⁷ Anthony Reid, David Bulbeck, Lay Cheng Tan, Yiqi Wu, *Southeast Asian Exports since the 14th Century Cloves, Pepper, Coffee, and Sugar*,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1998.

⁵⁸ （加）卜正民：《塞尔登先生的中国地图：香料贸易、佚失海图与南中国海》，黄中宪译，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版。

⁵⁹ 李斌：《明代中国与东南亚的香料贸易》，硕士毕业论文，暨南大学历史系，1998 年。

及对中国社会与经济的影响》一文，分别从“新物种的引进与传播”、“南洋物产及日用品之输入”、“中介文化：欧式生产品的间接传播”三个方面，对16-17世纪南洋物种（香药占有极大比重）输入中国的情形进行了系统介绍。⁶⁰田汝康的《郑和海外航行与胡椒运销》一文，论述了郑和下西洋所运胡椒对明人社会生活及政府财政带来的影响，作者认为，“胡椒在中国由珍品变为常物是郑和远洋航行所促成的改变”⁶¹，利用胡椒、苏木折赏支俸的方式，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明廷的财政危机。李曰强的《胡椒贸易与明代日常生活》一文，以胡椒进口贸易为切入点，对胡椒传入中国及其早期影响、明代胡椒进口贸易的兴盛、胡椒与明代日常生活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⁶²

除上述专文研究外，关于明清香药贸易的问题，明清海外贸易的论著中亦多有涉及。如李金明的《明代海外贸易史》、《明初中国与东南亚的海上贸易》，⁶³万明的《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中国郑和与满刺加——一个世界文明互动中心的和平崛起》、《郑和下西洋终止相关史实考辨》，⁶⁴李庆新的《明代海外贸易制度》⁶⁵，黄启臣的《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⁶⁶，陈希育的《清代中国与东南亚的帆船贸易》⁶⁷，田汝康的《中国帆船贸易与对外关系史论集》⁶⁸，等等。

⁶⁰ 郑甫弘：《明末清初输入中国的南洋物质文化及对中国社会与经济的影响》，《南洋问题研究》1995年第1期。

⁶¹ 田汝康：《郑和海外航行与胡椒运销》，《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

⁶² 李曰强：《胡椒贸易与明代日常生活》，《云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⁶³ 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明初中国与东南亚的海上贸易》，《南洋问题研究》1991年第2期。

⁶⁴ 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郑和与满刺加——一个世界文明互动中心的和平崛起》，《中国文化研究》2005年第1期；《郑和下西洋终止相关史实考辨》，《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⁶⁵ 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⁶⁶ 黄启臣：《清代前期海外贸易的发展》，《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

⁶⁷ 陈希育：《清代中国与东南亚的帆船贸易》，《南洋问题研究》1990年第4期。

⁶⁸ 田汝康：《中国帆船贸易与对外关系史论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综合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外学界关于香药贸易的探讨，多集中于地理大发现时期西欧各国对东南亚香药产地的争夺及贸易角逐。对香药的研究，除关注其食用、药用、防腐等实用功效外，更注重探讨香料的味对人的心理及性格产生的影响。国内学术界对于香药贸易的研究，从时段上看，大致划分为汉唐、宋元和明清三个时期。汉唐时期的中外香药交流，学界的研究多集中于陆上丝绸之路这一区域，对于海上贸易的情况则较少探讨；宋元时期的香药贸易受到学术界较多关注，且取得了丰硕成果，研究内容涉及香药的种类、产地、运销、贸易状况、储销机构、用途、影响等多方面；明清时期的香药贸易，无论是史学界，还是中医学界，皆鲜有学者问津，其研究成果零星地散落在研究海外贸易的相关论著当中，探讨时段亦多集中于明前期，且多将其看作朝贡贸易或郑和下西洋的分支问题进行探讨，很少将“香药贸易”作为研究的核心将其置于东亚海域的大背景下，从海洋史的角度进行深度考察，尤其是15-18世纪长期执东亚海域贸易之牛耳的华商从事香药贸易的问题几乎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盲点。截止目前，关于明清时期香药贸易的研究尚无专门论著出现。

21世纪以来，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掘、新理论的相继诞生，以及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家战略的提出，从海洋史的视角出发研究明清香药贸易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无论从研究资料、研究手段、研究条件，还是制度保障来看，相对于前辈学者皆具有更多优势。本研究力图通过对明清时期东亚海域香药贸易的探讨，在丰富中华海洋文明的基础上，提供了一个站在东亚海域看中国的新研究视角，并希冀为国家海洋发展战略尽以绵薄之力。

三、研究思路及史料介绍

本书选择明清香药贸易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对香药概念、种类、产地、功用及输入路径的梳理，勾勒东亚海域香药贸易网络的构建过程，探讨香药贸易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以及香药如何被应用的过程，以此追寻以香药为代表的物所承载的海洋文明对陆地渗透与影响的痕迹，思考官方和民间、中央与地方围绕海洋政策为核心进行的斗争与妥协。

本书正文共分五个部分，主要内容归纳如下：

第一章在对香药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对香药的种类、产地及功用做了细致梳理。笔者认为，不同时期香药的产地并非一成不变，在自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香药主产地常随社会需求的变化而变更，香药的多元功用亦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得以发掘。

第二章以时间为线索，对汉唐、宋元、明清三个不同历史时期的香药贸易背景做了简要介绍。从总体上看，香药贸易的规模由汉至清，呈不断扩大的趋势；香药贸易的区域，由陆地转向海洋；香药贸易的主体——官方和民间势力，呈此消彼长之势。

第三章主要介绍了香药贸易的航线及输入途径。由明至清，香药贸易航线远涉东西洋多国，贸易网络呈“小”→“大”→“小”的格局。香药输入中国的途径主要有朝贡贸易、郑和下西洋、民间贸易、西人中转四种方式，明前期以朝贡贸易和郑和下西洋活动为主，明中叶以后，民间贸易和西人转运占据主导。

第四章从香药贸易与政府财政、沿海经济、个人财富三个层面，探讨了香药贸易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多重影响。透过分析我们发现，在香药贸易

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的过程中，时常充斥着官方与民间、中央和地方为了各自利益而进行的斗争与妥协。

第五章从宗教祭祀、医疗保健、日常饮食三个方面，阐述了香药在中国社会的运用情况。各类香药在中国社会的应用过程不仅完成了其自身从奢侈品到日用品的身份转化，而且彰显了海洋文明对陆地的辐射与影响。

由于香药贸易与明清中国社会这一课题，既涉及到海外交通史、日常生活史的相关内容，又离不开对医学史的探讨，因此资料分布十分零散。根据笔者的搜罗、查阅，与本研究相关的资料主要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香谱、医书、本草类书籍。目前史学界关于香药的研究对香谱中的资料有所涉及，但较少运用历代医书和本草类书籍中的资料。目前保存较为完整的香谱主要有洪刍的《香谱》、陈敬的《陈氏香谱》和周嘉胄的《香乘》，三种香谱中记录有各类香品和大量香方。《唐本草》、《海药本草》、《本草衍义》、《证类本草》、《食物本草》、《本草纲目》、《本经逢源》等本草类书籍，详细介绍了每种香药的特性、功效及使用禁忌，通过对历代本草类书籍中所记香药种类及内容的详略性和准确度的分析，我们可以大致梳理出香药在医药领域的应用历程。《外科精要》、《寿亲养老新书》、《丹溪先生心法》、《局方发挥》、《卫生宝鉴》、《普济方》、《医宗必读》、《赤水玄珠》、《证治准绳》等医书中，记载有丰富的医方，从总体上看，添加香药的医方在各类医书中所占比重呈逐渐增加的趋势。

第二类，日用类书、食谱。《居家必用事类全集》、《遵生八笺》、《多能鄙事》、《便民图纂》、《群物奇书》、《竹屿山房杂部》、《万宝全书》、《墨娥小录》等日用类书中，记载了大量使用香药的香方、医方和食单，而这

类书籍中关于香药应用的记录，最能反映香药在广大民众中的使用情况。万历九年重刻本《居家必用事类全集》，黄希贤所作的《序》中即说道：“《居家必用》一书，由来久矣。首尾凡十卷。其书事兼四明，录及九流，博大知悉，罔不具备。大都摘群书之关要，诚家居者，必不可少也。”《饮膳正要》、《易牙遗意》、《随园食单》、《食宪鸿秘》、《老饕集》、《养小录》、《醒园录》、《调鼎集》等食谱中，记载有诸多使用香药作为作料的食单，通过比对发现，不同时期香药运用于饮食的情况有较大差别，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时人饮食观念的转变。

第三类，海洋图书。《岭外代答》、《诸蕃志》、《岛夷志略》、《真腊风土记》、《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西洋朝贡典录》、《顺风相送》、《指南正法》这类图书的作者或亲赴海外，或听人描述、各方搜集，记录了大量有关香药特性及其产地的知识。《东西洋考》则系统记录了官方视野下海外诸国的概况、海洋贸易的航线和税收等相关问题。《郑和航海图》、《明代东西洋航海图》、《清代东南洋航海图》等航海地图，分别从官方和民间的视角，详细客观地呈现了明初至清中叶，华人在亚洲海域的香药贸易网络。

第四类，日记、文集。明中叶以后，西方人开始进入亚洲海域，并积极参与到中国、东南亚、南亚的香药贸易中来。江树生译注的《热兰遮城日志》（共四册）详细记录了1629年至1662年间，大员与东南沿海及巴达维亚间的贸易往来，该日志虽以流水账的形式记录，却大量保存了大员与东南沿海间的贸易清单，其中涉及香药运销和交易的资料十分丰富。马士所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大量记载了清代

以英国人为主体的西方人参与对华香药贸易的情形。《东印度航海记》、《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中国和东印度群岛旅行记》、《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热带猎奇——十七世纪东印度航海记》、等书，生动描绘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以及亚洲海域的香药贸易活动。《林次崖文集》、《典故纪闻》、《菽园杂记》、《陶庵梦忆》、《鐙窗丛录》、《墨井集》等文集中亦散落了大量有关香药贸易及应用的信息，值得仔细搜罗整理。

第五类，官方正史。主要包括明清实录、（正德）《明会典》、（万历）《大明会典》、《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明经世文编》、《明史》、《清史稿》等。明清时期，统治者屡次颁布禁海令，海外贸易政策多有变动，官方正史中的相关史料对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香药贸易的性质颇为重要。同时，这类资料中记录有大量关于朝贡贸易的信息，成为探讨明前期香药贸易不可或缺的资料。

第六类，地方志书。主要包括省通志、府县志、乡镇志等。诸多方志的“番夷志”、“赋役志”、“风土志”、“杂物志”等门类中涉及有香药进口种类、香药税额、香药在当地的应用情况等相关问题，但由于其分布较为零散，加之时间有限，笔者未能很好地将不同方志中有关香药的记载进行比对分析，有效利用。

（本文为杨国桢主编《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第五卷，涂丹著《香药贸易与明清中国社会》绪论，人民出版社2016年，注释从略。）